

茶座

总第七辑 2007.1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马忠文：光绪帝之死

张 鸣：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

裴宜理：中国学研究的机遇、视角与挑战

王振忠：古代书札：传统社会的情感档案

辛德勇：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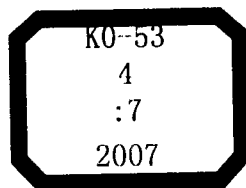
孙言诚：复旦二周

刘 超：“大分流”：左联旧雨遇新风——三个人的1943年

睦达明：古代秘书与酒

山东人民出版社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 | 历史学家茶座 **7**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3

ISBN 978-7-209-04204-8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165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项目负责 王海涛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张智慧 封面设计 李海峰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历史知识与历史创造

王学典

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历史热”，——此“热”用“滔滔天下”来形容，恐怕丝毫不为过。——从易中天到于丹，所讲无一在历史之外。空前现实的国人为何突然特别钟情于无用的历史？笔者曾一度困惑不已。后来，一位哲人写于60年前的一段话使我顿悟：“思维，是最善于找到自己的出路的。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恋爱；你不准谈人间，他就谈天上；你不准他谈现在，他就谈过去；反正他总要找条出路。”“历史热”的崛起无疑是对“现实冷”的一种平衡与补偿。探讨“历史热”出现的深层原因，当然不是这里的重点，笔者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热”所提供和传播的那些所谓“历史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感到历史知识与新的历史创造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这一点实际上一直被严重低估乃至忽略了。

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于哈耶克所举的一个事例。长期以来，史学界所提供的“工业革命”的图景是：“皮包骨的童工，暗无天日的矿区，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等等，总之，这些知识告诉人们：“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上最穷、数量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苦难加重了。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但哈耶克认为，正是这些并非真相的知识“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很多地区的制度安排。

历史研究、历史知识的提供肯定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所以，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与学术创造本身一样，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在盛友如云的史学茶馆里，我们决不能像在街头巷尾的茶桌旁，传播那些证据不足、甚至“于史无征”的道听途说和充满偏见的“事实”。因为你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很有可能像种子一样，不知撒在哪块心田里，有朝一日，这粒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影响历史进程。

因此，在学人《茶座》“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的整体定位的前提下，本茶馆对每一位座上客还有一些基本要求：求真、求善、求美。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历史知识与历史创造

人物春秋

- 007 郭 梅 慈禧的戏瘾和演技
012 马忠文 光绪帝之死
018 张 鸣 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

域外来风

- 024 裴宜理 中国学研究的机遇、视角与挑战
027 刘 平 探索传统农民反抗与现代革命的关系

公私档案

- 033 王振忠 古代书札：传统社会的情感档案
046 冯克力 《老照片》与百年中国

书林琐记

- 056 辛德勇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九州风土

- 066 张伟然 湘女多情

075 曹树基 移民与古民居——浙江省遂昌县田野考察之一

人文遐思

088 罗新 雪中的游思

学坛述往

095 邵建 负笈北美时的胡适

105 刘超 “大分流”:左联旧雨遇新风——三个人的1943年

114 孙言诚 复旦二周

123 散木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一)——关于赵纪彬先生

一家之言

133 李鸿宾 历史工程与艺术审美

掌故钩沉

139 陈维国 清人吸烟趣谈
黄志繁

145 眭达明 古代秘书与酒

旧案重审

151 李友松 血吸虫病致曹操兵败赤壁



慈禧的戏瘾和演技 郭梅*

很多人都知道，慈禧太后虽然是清末近五十年里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头上顶着国母老佛爷的神圣光环，骨子里其实也无非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和她的绝大多数臣民相同的娱乐爱好——看戏。

说句实话，慈禧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寡淡得很，没有电影院，没有电视机，没有因特网，没有什么明星可以追捧，没有多少绯闻可以扯淡，更别提如今风行的网络游戏了。所以，“治国之余”看看戏、听听曲，实在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太后唯一的选择。不过，慈禧毕竟贵为太后，她的戏瘾也有着浓烈的皇家气派，不必说颐和园中那翘角重檐、朱栏绿柱的德和园大戏楼，也不必说按惯例每个月起码演两次的应节大戏，光说说她老人家看戏的古怪习惯就够了。

慈禧看戏的第一怪癖是“避讳”。

其实，“避讳”是咱们的“国粹”，算不得老太后的个人“特色”，只不过，慈禧的“避讳”更“精致”、更“臻于化境”罢了。

满人未汉化之前，并不注重什么礼仪尊卑，更没有“避讳”一说，用汉人妄自尊大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未曾开化的蛮夷之族”。但是，打从入关起，满人在文化习俗上几乎“全盘汉化”：汉人提倡三纲五常，他们也提倡三纲五常；汉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他们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汉人讲究“避

* 郭梅，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讳”，他们也讲究“避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上的文字狱以有清一代最为惨烈，便为明证。弄到后来，下级官员面见上司前，必修的第一门功课就是把上司的祖宗十八代牢记在心，免得一不小心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得罪上头，坏了自己的前途。

慈禧是太后，要显示太后的威仪，规矩自然比一般人更加苛刻——她不但许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属相也不能提及。这，自然苦煞了替她唱戏的那班伶人。

因为慈禧是属羊的，所以《变羊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名称里带“羊”字的戏一律不能唱，每一句唱词中也不准出现“羊”字。当时惯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伶人陈德霖在供奉内廷的时候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著名武老生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这和唱戏毫无瓜葛，可也照样犯了忌讳，慈禧从此再不打赏于他，还吩咐下边：“不许给王四（王福寿）赏钱，他天天刚我，我还赏他？！”诸位看官，您说这位王老板冤不冤？早知如此，当时倒不如开间牛肉铺罢了——不过，只怕慈禧还会说“牛羊一家亲”，仍然要找他的茬。

慈禧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譬如说，她决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话——列位看官，或许，这还算得上咱们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呢！

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在台上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止，让人把戏提调传来责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训斥却还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至高无上的太后老佛爷。后来向内侍请教，才知道是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大忌讳——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只挨了一顿骂没挨板子、没掉脑袋还算是走运的呢。相比之下，净角麻穆子就倒霉多了，有一次唱《双钉记》，他老老实实按祖宗传下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他重打了八十大板。

此外，在太后面前唱戏，尤其是在太后生日前后连演九天大戏的节骨眼儿上，唱词中“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眼更是大大地犯忌讳。怎么办呢？只有靠伶人们的时刻警觉了。一旦祸从口出，只怕身家性命立即不保。有一次，正

逢慈禧大寿,宫中上演大戏,老太后点了一出《战太平》。主角谭鑫培在即将唱到“大将难免阵头亡”那一句的时候,灵机一动,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太后听了很是高兴,当场打赏——至于谭鑫培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她老人家是压根不管的。

除了讲究避讳,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只要有一个演员唱错一句,或者有一个地方荒了腔走了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往往都会被吊销,所以,演员们在台上个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慈禧御用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演唱所需要的时间,那是为了防止艺人偷工减料,如果没有唱够时刻,也是要受重罚的。现在在清宫升平署的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剧本和戏词本,它们一律用白皮纸书写,外面用明黄纸做封面、封底,封面上贴红色纸签,写着戏名,专供慈禧太后翻看,称为“安殿本”。这安殿本共有两种,一种是慈禧早年用的,尺寸小,字也小,宽窄和现在的稿纸差不多。另一种尺寸加宽了不少,字也放大了许多,是供太后晚年老眼昏花时使用的。看着它们,就知道当年的伶人曾经受过多大的罪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慈禧太后如此“高标准”、“严要求”,客观上也使京剧走上了精益求精的艺术道路,当年花部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雅部,慈禧太后功不可没哦,而京剧艺人们也真该“谢谢”老太后的严格把关。

另外,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戏看得多了,还进一步“培养”出了改戏的雅兴。

《昭代箫韶》(《杨家将》)本为十大本共计二百四十出的昆曲连台大戏,慈禧太后不喜欢典雅斯文的昆曲,便亲自领衔把它改编成皮黄剧本,再交由升平署排演。翻制改编时,太后通常会把太医院和如意馆中通文理之人悉数传召到偏殿,分班跪于殿中,由慈禧按着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工记忆。退出殿外之后,大家按照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润色,再呈送给慈禧过目定稿,最后把稿子送到升平署去。这项浩大的工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庚子之役被迫中断,两年中共翻改了一百零五出。而《节义廉名》(《四进士》)则是慈禧太后在晚上就寝前和坐更的宫眷“合作”改编的,主要的合

作者是慈禧的书法老师繆嘉蕙。

慈禧太后编戏以后,大约觉得自己极有“剧作家”的天分,心中得意,从此便添了乱改戏词儿的毛病。她经常心血来潮地把剧本改得半通不通,然后命艺人演唱给她听,以此取乐。有一次,她把《混元盒》中的一段唱词改得面目全非,无辙无韵,长短不齐。拿到如此唱词的演员个个面面相觑,冷汗涟涟。幸亏主唱的是人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他腹笥宽,脑子也转得快,于是边编腔边唱曲,居然还唱得有板有眼,因而侥幸受到慈禧的奖赏。

显然,从爱看戏到爱自己编戏,太后老佛爷是爱屋及乌,而动用朝中文士浩浩荡荡地大搞特搞,则多少有些个国家文化精品工程的味道了。可惜,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改编的《昭代箫韶》在戏剧史上的影响并不大,慈禧太后的心血算是付诸东流了。

就像如今的戏迷往往喜欢穿回戏服拍套艺术照过过瘾,当年的慈禧太后过足了听戏瘾和编剧瘾之后,接下来,自然便是要过过扮戏瘾了。



慈禧(中)扮观音图,李莲英(右)扮善财童子

慈禧要演戏,自然不会去扮路人甲、邻居乙、村人丙之类的角色,她要顾及身份。即便是让她演皇帝、皇后之类的,只怕也不会过瘾。而既然凡人不能演,那唯有演仙人、超人了。慈禧信佛,所以,晚年的她便经常以扮观音菩萨自娱自乐,现在还能看到不少慈禧扮成观音拍的照片,便可足证。

从照片上看,慈禧头戴毗罗帽,外加五佛冠(冠上有五瓣莲花,每瓣上绘有一尊佛像,代表五方五佛),手持柳枝净瓶,站在颐和园昆明湖盛开的荷花丛后,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大总管李莲英则在慈禧身边作韦

驮状。慈禧扮观音的龙头奇大,有时她会一天换几个造型,还让身边的侍从都扮成童子、护法陪她一起在昆明湖的画舫上演观音戏。可以想见,那时节,这座堂皇富丽的皇家园林就变成了一个闹哄哄上演佛家戏的大舞台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老太后经常性的训练下,侍从女眷们的演技得到了相当的磨炼,不但能给扮观音的太后配戏,自己独立担纲主演也丝毫不怯场。据德龄女士的《清宫二年记》所记载,美国女画家卡尔有一段时间得到特许,待在紫禁城里给慈禧太后画油画肖像,有幸和太后及众宫眷共进晚餐。按祖宗规矩,陪太后一起吃饭的人,包括皇后娘娘在内,都得站着用餐。但是那天傍晚,德龄吃惊地发现饭厅里摆好了每一个人的椅子。慈禧太后把德龄叫到身边耳语一番:“我不要密斯卡尔说我们野蛮,如此对待皇后和宫眷,因为她并不知道这是祖宗的礼法。所以你们就坐下吃吧,不要来谢我,要做得自然,好像你们本来就是坐着吃的。”德龄立即悄悄给在场的每个人传达了太后的旨意,于是,大家迅速进入角色,演得丝丝入扣,硬是没让见多识广的卡尔女士看出些许破绽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宫廷和官场是一个大舞台,慈禧太后当然深知个中三昧,所以身体力行,在那儿演了半个世纪的好戏。应该说,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中,她的演技着实了得。卡尔女士后来回忆说,太后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善的妇女”,而且是一个“清代的大人物,也是奇女子。禀性慈善,爱国爱民,对国事极为热心,关心民生和国势强弱”。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外国人眼中如此“优秀”、如此“善良”的女政治家,实际上却是一条寄生在腐朽国家机器上的蛀虫呢?最后清帝国的轰然倒塌,这位统治了中华大地近半个世纪的老妇人也真算得上是“功不可没”了——她的“出色”演技,为黄昏的帝国抹上了惨淡而凄凉的一笔。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仍然心追神慕着慈禧的戏瘾并且身体力行地模仿着老太后的演技?

光绪帝之死 马忠文*



光绪帝读书像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1908年11月14日下午五时左右),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西苑涵元殿死去,二十二个小时后,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近代以来的野史笔记中,流传着光绪是被暗害的说法:或云系袁世凯、庆亲王奕劻、李莲英蓄谋毒害而死;但更多的则说慈禧自知病将不起,不甘心死于光绪之前,所以才下了毒手。这类宫闱秘闻,不仅小说家津津乐道,通常也是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直颇有影响。

然而,野史笔记的这些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朱金甫、周文泉两位先生利用清宫所藏医案记录,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了光绪与慈禧的死因,指出光绪帝实因长期患有癆瘵,病入膏肓,脏腑皆已坏死,最后心力衰竭而亡;至于慈禧则因年迈体衰,病情逐渐

* 马忠文,《历史研究》副编审。

加重,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生突变,很快死去。光绪之死与慈禧之死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两人病死于同一日,完全是一种巧合。

看看光绪帝的就医史,事情的原委也可略见一二。光绪帝自幼体弱多病,戊戌政变后遭到幽禁,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辛丑年底两宫自西安回銮后,朝廷屡次征召名医为皇帝诊病。光绪三十二年,庆亲王奕劻与军机大臣瞿鸿禨荐举闽籍名医、商部主事力钧(字轩举),与工部尚书陆润庠同时入宫为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脉。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病情加重,太医院御医诊治无效,又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莲舫)和曹元恒入京诊脉,然见效亦甚微。因病情没有好转,皇帝不免急躁,每每迁怒于陈莲舫等人,抱怨“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又称“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显然,光绪帝对名医的诊断并不满意。五月初八日,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再次催调名医入京。稍后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鍾骏、施煥、张鹏年等来京供差。自六月十三日开始,新来的名医陆续由内务府大臣带领为皇帝诊脉,并将每次为诊治的脉案及所开医方抄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京内各部院衙门,并各省将军督抚等阅看;朝廷还要求疆臣继续保荐名医入京。

当时,皇帝的健康状况也成为京城士大夫关心的话题。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在日记中对“圣躬违和,药饵无效”之事甚为忧虑。八月初一日,恽毓鼎听到光绪帝病危的传言,急忙到庆王府探听消息,结果虚惊一场。不过,他了解到的情况是:皇帝因腰痛特剧,不能起坐,所以连续几天不能召见军机大臣,至于其他外臣则有一个多月没有召见了。八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召见时,“两宫泣,诸臣亦泣”,除了时事艰危的因素,皇帝病情的严重自然也是引起君臣伤感的原因。八月廿六日,慈禧与身患重病的光绪皇帝从颐和园启驾回到紫禁城,驻蹕西苑,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九月底,光绪帝的病情持续出现恶化。当时皇上已是“步履其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不能独自一人行走了。十月初十日,慈禧的寿诞就要到了,重病在身的皇帝因想到不能正常行叩拜大礼而伤心痛哭。因光绪帝病重,慈禧万寿典礼只好从简,往年太后升仪銮殿,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薰门外行礼,此次则改在内

廷行礼,仪式草草结束。

万寿节过后,慈禧也患病,且与皇帝一样,病情不断加重,十天后二人相继死去。入直宫廷的军机大臣鹿传霖与军机章京许宝衡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将这些记述排比整理,大致可以看到事情的原委。

十月十二日,慈禧感冒伤风,身体不适。光绪帝至是日已八日未解大便,病情严重。两宫未御勤政殿召见军机大臣。唯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到仪鸾殿太后寝宫问安。

十月十三日,慈禧腹泻,且心绪拂逆。两宫仍未御勤政殿。

十月十四日,两宫仍未召见军机大臣。梁太监传懿旨,若有应面奏事仍召见,但斟酌召见处所,庆亲王以有事对,九时仍御勤政殿,召见军机。决定派庆亲王赴普陀峪地宫。

十月十五日,庆亲王启程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

十月十八日,光绪帝不能坐立,未召军机。是日寅刻即传诸医伺候,九时三刻内务府大臣率御医退出,醇王载沣与诸位军机大臣详问病状。

十月十九日,慈禧周身痛疼,整日未进食,未召见军机。军机处发庆亲王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密告鹿传霖,慈禧脉气极弱,恐脱。当晚,鹿传霖赴礼亲王世铎府谈要事,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

十月二十日,两宫病皆亟。庆亲王辰刻抵京。军机已刻入对于仪鸾殿内,庆亲王未到。午后光绪病危,报庆亲王,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命醇亲王为摄政王,其子溥仪入宫教养,代批折件。

十月二十一日,两宫病势颇危,梓宫(棺木)均已敬备。隆裕皇后往来两宫视疾,两目哭尽肿。酉正二刻五分光绪帝崩,而禁门已闭。执事者电话通知各王公大臣,候于内务府公所。亥刻始启门,醇亲王、庆亲王与军机大臣同赴慈禧寝宫,奏醇王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并兼承光绪皇帝之祧,令摄政王监国,尊慈禧为太皇太后,隆裕皇后为兼祧皇太后。

十月二十二日,军机章京拟进尊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谕旨,又拟进御名改避谕旨,又拟进懿旨飭阁部院议摄政王礼节,又拟进谕旨停止各

直省将军以下来京,并拟各奏片命内监进述,奉太皇太后谕依议。十一时闻慈禧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太皇太后旨行。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亲王、军机大臣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大行皇帝于巳时奉移入乾清宫,大行太皇太后于酉时奉移入皇极殿。

鹿传霖、许宝衡日记所记虽不及清季以来的野史传闻那么生动,却是实录,他们各自所记之事与稍后舆论所报道的内容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

十月二十三日,《申报》刊《追纪大行皇帝病情》称:

十六日京函云:皇上自入秋以来足痛等疾日见痊愈,近因皇太后万寿、达赖觐见等事,过于劳动,诸病遂复转剧。至十二日即不召见军机。诸大臣恭请服药,皇上又不愿再服。……十四日慈圣特召醇邸密议,奏对至一点钟之久。醇邸甚为惶恐,此后又迭召各王大臣入内商议,闻各王大臣退出后,咸有忧惧之色。皇太后本有微疾,自皇上病逐渐加重后,焦虑殊甚,夜不寐者数日,故病亦增剧云。

十月三十日,《申报》又刊发《宫廷三日大事记》,缕述光绪、慈禧驾崩及嗣皇帝继位的过程:

万寿节后大行皇帝积劳成疾,累日大便不解,至二十日下午病势增剧,以大便初下力不能支,不省人事,晕而复苏者数次。王总管急遣内监禀知慈宫,奉慈谕连召军机,于是枢臣散而复集,一钟时进内,慈宫屏退内监,密对一钟,慈宫泣,枢臣都垂泪。三钟时又召枢臣,庆、醇两邸先入(是时庆适由奉回京),稍缓枢臣续进,遂定醇邸为摄政、醇子为大统之议,慈宫并谕以不可推诿。是晚,大行皇帝病又增,喘咳气雍等症相继而至,汤粒不进,人事不省。按,向例皇后每日只到皇上前请安一次,其余嫔妃非奉上召,不得入宫。是晚病虽垂危,仍由内监照常服伺。廿一日仍不召见,折片均由醇王批行。慈宫因昨晚病亦加剧,即

谕飭内阁礼部另议摄政王仪节，一面以今上入宫教养之旨电寄各将军督抚。而枢臣知上危在旦夕，散值后各堂多至地安门外张中堂公馆商议要事。午后又集醇邸镇日，在枢垣传齐满汉小军机商拟遗诏，闻系张中堂主稿，并由枢堂传谕内务预备吉祥板、吉祥轿。六钟西苑门照例关门。七钟时传出升遐消息。十钟枢臣及各部院大臣会集而禁门不开。十一钟庆、醇邸齐到，阁者以请旨对，良久乃开，醇、庆率枢臣进，其余各大臣仍不得入。廿二日黎明颁布遗诏，始开西苑门，用吉祥轿将御躬送入景山内之寿皇殿奉安梓宫，后及妃嫔相继偕往哭祭……

日记是私密性很强的文献，报章则是当时公开的信息来源，在两宫崩殂之事上，彼此的记载却基本一致，这恰恰说明这些文献对相关过程的记载是可信的。相形之下，那些描述生动的野史就显得漏洞百出了。

《慈禧传信录》说，光绪帝虽然有病，“然实非死疾，仍排日视朝。此时太后亦病，自知将不起而恐死先于帝，则必翻戊戌旧案。……后万寿，帝犹起行礼，然步行已需人扶掖。面后，后曰：‘尔尚未死耶？’帝知旨，归而疾大渐，越十日遂崩。”对照上述日记，这段传闻的荒唐便一目了然。又如王照《德宗遗事》中云：“吾闻南斋翰林谭君及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证以他友所，亦大概如是。”言外之意，似乎光绪帝死得太突然了。可是，早已行走不便的光绪帝怎会在死前两天还能信步湖边？马叙伦《石屋余渚》记述了一段闻自老太监的口碑：“德宗居瀛台，仅长随数人，复不时更易，崩之际无人在侧。及太监入，见帝仆榻下，体如弯弓，亟白皇后，舁至内殿陈殡。或云，帝崩于刺，实以遇毒为近。”这些说法恐系传言，岂有可信之处？

当然，宫廷历来都是政治阴谋的渊藪，时人对光绪帝的死因产生种种猜测也不是毫无原因的。光绪亲政后，与太后的关系时有不洽，帝后相厄始终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特别是甲午、戊戌、己亥、庚子年间，种种谣言弥漫朝野，甚至有光绪病死的消息传出。辛丑两宫回銮后，虽“母子一心”，力行新政，但太后虐待皇帝的传闻仍不绝于耳，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帝后相隔一天而死很容易引起猜疑。

笔者以为，从种种情况判断，慈禧恐怕没有加害光绪帝的动机。尽管在慈禧